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十一期（一九九一）



## 研究概況

### 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

黃 克 武\*\*

清代考證學的興起可以追溯到明末中國思想界的巨大變化，這個變化伴隨著明亡清興的歷史變局、社會經濟的變遷，以及耶穌會士引進西學的衝擊，對中國近三百年的學術思想產生相當深遠的影響。明末思想轉變的基線是從「理學」轉向「實學」，亦即從道德形而上學的關注轉移到對實際事物的高度興趣。具體而言，這個轉變的過程包括三個主要的學術方向，一為氣的哲學，一為經世之學，一為考證學。這三者後來成為清代學術思想的主流，其影響一直延續到十九和二十世紀。以考證學來說，甚至一直到今天還是一個具有相當支配力量的學術理念。①

氣的哲學、經世、考證三者雖同時展現了儒學由抽象轉向具體的精神，其間有互相增強的作用，但亦各自有其獨立的起源與發展。以氣的哲學（亦稱氣的一元論）來說，它為理學內部的發展，是針對程朱理氣二元論而起的反動，這種哲學強調本體論的基礎是物質性的「氣」（英文多譯為 material force 或 ether of materialization），認為理與氣合而為一，而理只是氣的一方面；其思想可追溯到明代程朱學者羅欽順（1465~1547）以及王學中從劉宗周（1578~1645）到黃宗羲（1610~1695）一系的發展，至清代則以王夫之（1619~1692）、戴震（1723~1777）、阮元（1764~1849）的哲學為代

\* 本文撰寫過程中曾與墨子刻教授 (Prof. Thomas A. Metzger) 多次討論，獲益良多；又蒙康無爲教授 (Prof. Harold L. Kahn) 指正，特此誌謝。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① 在當代臺灣許多學者仍從事考證的工作，傅斯年曾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旨趣是「保持亭林（顧炎武）百詩（閻若璩）的遺訓」，杜維運也曾在 1972 年「二十年來我國的史學發展」討論會中指出近二十年來「考據仍然是史學的主流」，考證傳統在臺灣史學界延續不斷。至於在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之後「實事求是」——清代考證學的口號——又為學術界所強調。這個口號雖是針對馬克斯主義下的「影射史學」而發，但與乾嘉傳統不無關係。見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民國 17 年）。〈二十年來我國的史學發展討論會記錄〉，收入李弘祺等著：《史學與史學方法論集》（臺北：食貨出版社，民國 69 年），頁 376-383。

表。②至於氣的哲學與考證的關係則頗歧異，例如黃宗羲、戴震的考證學可能與其氣的哲學有密切的關係，但楊慎（1488～1559）、陳第（1541～1617）、方以智（1611～1671）的考證工作則與氣的哲學之關係不深。經世與考證二者也有分途與合流的錯綜關係，有些學者的考證工作源於經世之志，並以考證來表達經世的意念；有的學者的考證工作則純粹出於知識上的興趣，與經世的理想背道而馳。至清末二者的關係更為複雜，舉例言之，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與「孔子改制考」是以考證的型式來建構經世的理論；而錢穆的「劉向劉歆父子年譜」則以考證的作品來批評康有為。③總之，由於這三種學術取向的交錯發展，再加上數百年來理學的背景與西學的衝擊，近世實學的起源問題成為一個迷人的學術挑戰，而學者們在相互辯論的過程中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解釋。

有關近世氣的哲學與經世思想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在此不擬細述，④

② 山井湧：〈明清時代における氣の哲學〉，《哲學雜誌》46: 711(1951)，頁82-103。後收入氏著：《明清思想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頁149-175。

③ 有關考證興起與經世思想的關係見陸寶千：〈論清代經學〉，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3（民國64年），後收入《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民國67年）。余英時也指出戴震、錢大昕、汪中等考證學者始終不能忘懷經世致用，見《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收入《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6年），頁429-430。有關汪中思想中考據與經世的關係見周啟榮“Scholar and Society: The Textual Scholarship and Social Concerns of Wang Chung (1745-1794).”載《漢學研究》，第4卷，第1期（民國75年），頁297-313。考證與經世的衝突反映在章學誠對考證的批評之上，他以為考據學者只知「補苴墮續」，未能掌握「史義」；史義有兩層含義，一方面是「綱紀天人，推明大道」，另一方面則是「史學所以經世」。見章學誠：《浙東學術》與《答客問上》，收入《文史通義》（臺北：史學出版社，民國63年）。對康有為「二考」的精采研究見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76年），頁61-208。

④ 有關近世經世思想的研究甚多，見《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3年）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上也有多篇重要著作，有關《經世文編》之研究的評介見拙著：〈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期（民國75年）頁83-96。英文方面的新作有 Benjamin A. Elman,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而有關氣的哲學之研究除了山井湧之外還有胡適：《戴東原的哲學》（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56年）；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香港：新亞書院研究所，1974）；Wm. T. de Bary ed.,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中有多篇論文與此有關，如 Ian McMoran, "Wang Fu-chih and the Neo-Confucian Tradition," Chung-ying Cheng, "Reason, Substance, and Human Desir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Neo-Confucianism"; 另有 Irene Bloom 對羅欽順的困知記之翻譯與研究，見 *Knowledge Painfully Acquir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本文的焦點是近世考證學的源起，作者企圖澄清自民初以來中西學術界對此問題的解釋及其互相辯論的歷程，並思考未來研究的方向。

民初以來學者多同意考證學的興起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但各學者因著重點不同，有下列六類的解釋：

1. 考證學源於明末前後七子的復古以及楊慎、陳第、方以智等人個人的經歷與博學的雅好。
2. 考證學受到耶穌會士所傳西學的影響。
3. 由於清廷的高壓統治與籠絡，士人參加政府的學術計畫或自行從事與政治無關的考證工作；並有學者由此評估考證學者精神上的淪落。
4. 考證學與社會經濟變化有關，社會中的許多成員如官員、商人的獎掖、出版印刷業的發達以及人口的成長都直接間接促成此運動的發展。
5. 考證學源於思想性的因素或儒學內部的發展，例如認為考證的興起涉及對宋明理學「空談心性」之反動，或認為受程朱陸王的辯論、氣的一元論的提出或經世思想的出現等因素影響。
6. 認為考證學的出現是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的交互影響，並強調上述第四項社會經濟變化的重要性。

上述解釋因素的排列順序主要不在提出時間的先後，而在性質上的不同。

有關考證學興起的第一個解釋將之追溯到明末前後七子文章之復古，以及楊慎、陳第、方以智等人個人的經歷與博學的雅好。例如朱希祖與蕭一山認為：

竊謂清代考據之學，其淵源實在乎明弘治嘉靖間前後七子文章之復古……然欲作秦漢之文，必先能讀古書，欲讀古書，必先能識古字；於是說文之學興焉。……然古書之難讀，不僅在字形而尤在字音；於是音韻之學興焉。

他們認為楊慎的「古音叢目」、「古音餘」，陳第的「毛詩古音考」是由此而來，而顧炎武（1613~1682）的「音學五書」也是繼承此傳統。<sup>⑤</sup>

錢穆雖然沒有提到明末前後七子，但同樣地將顧炎武、閻若璩（1636~1674）考證工作追溯到楊慎、陳第、梅鷟（生卒不詳，主要活動時間約於十

<sup>⑤</sup> 蕭一山：《清代通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6 年）冊 1，頁 941-942。所謂前七子是：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廷相、康海、王九思。後七子是：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良、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

六世紀初葉)、焦竑(1540~1620)、方以智等人，他引用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論方以智通雅：

明之中葉，以博洽著者稱楊慎，而陳耀文起而與爭。然慎好僞說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勝。次則焦竑亦喜考證，而習與李贊遊，動則牽綴佛書，傷於雜蕪。唯以智崛起崇禎中，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一掃懸揣之空談。而這些明末先驅者的考證興趣一方面是個人對博學的喜好與友朋之間相互辯論而起，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宋元的傳統。<sup>⑥</sup>

至於個人經歷對考證興起的影響可以以陳第為例，根據容肇祖的研究，陳第考證的方法「大約本著他的家庭傳習的法律的觀念（其父為老吏），而推用到考證古書上」。陳第自己也說他讀書時常參看傳註不同的解釋而作判斷，有如斷獄。<sup>⑦</sup>其後的學者也同意前後七子的復古與楊慎的特起，以及受楊慎影響的焦竑、陳第等人對晚明考證學的興起有相當的助力。<sup>⑧</sup>

有關考證學興起的第二個解釋是強調耶穌會士的影響。梁啟超指出：

自明之末葉，利瑪竇等輸入當時所謂西學者於中國，而學問研究方法上，生一種外來的變化；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後則漸應用於他學。<sup>⑨</sup>

事實上，明末清初學者如焦竑、陳第以及劉獻廷(1648~1695)似乎都受到利瑪竇所譯有關拉丁拼音字母之著作的影響，而認識到拉丁字母在拼寫古音上的價值，三人在考證音韻的研究上有重要成就，成為清代考證學者的先驅。<sup>⑩</sup>

彼德生(Willard Peterson)有關方以智(1611~1671)的研究也顯示耶穌會士所傳西學與十七世紀思想變動有關。方氏一方面是一個耶穌會士傳

⑥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冊1，頁135-136。錢氏雖詳細分析了陳第與顧炎武考證作品的連續性，但並沒有說明陳第等人考證的淵源，筆者推測他認為這些人是襲自宋元以來考證之風，例如錢穆在朱子新學案一書中詳細地說明了朱子的考證學，見《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民國60年），第五章。

⑦ 容肇祖：《明代思想史》（臺北：臺灣開明書店，民國51年），頁279。

⑧ 林慶彰：《實證精神的探求——明清考據學的發展》，收入《中國文化新論學術篇：浩瀚的學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0年），頁298。

⑨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長沙：商務印書館，民國10年初版、民國29年國難後四版），頁46。

⑩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p. 216。有關劉獻廷的貢獻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41-44。

入西學的評註者，另一方面他又從未真正地醉心於理學；他個人選擇了以考證與有益社會之研究工作作為安身立命之處。<sup>⑪</sup>方氏的生平經歷成為十七世紀思想變動的一個重要案例，這個案例顯示在主流的學術辯論（理學對心性的辯論，下詳）之外，其它因素如個人的抉擇或西學的影響也促成考證學的興起。

有關考證學興起的第三種解釋則著眼於當時的政治環境，亦即認為：由於滿族對士人的壓迫，因而促使他們轉向考證學的研究。首持此說的可能是清末力主反滿的民族主義史家章炳麟（1869～1935）。<sup>⑫</sup>梁啟超也指出：「異族入主中夏，有志節者恥立乎其朝；故刊落聲華，專集精力以治樸學」。<sup>⑬</sup>此外，亦有人強調清初文字獄更對士人造成內心的強烈恐懼，故轉而從事考證，例如 Luther Goodrich 與 Lawrence D. Kessler 的作品詳細描述了清初皇帝為消解士人反滿情緒發起了各種不同的運動，<sup>⑭</sup>在這種環境下，不具政治色彩的（apolitical）考證學逐漸興盛起來。

錢穆與唐君毅（1909～1978）都支持此說。錢穆認為宋明學者的理想是得君行道，以天下為己任，但乾隆時皇帝卻公然表示「以天下治亂為己任尤大不可」，難怪「乾嘉學術一趨訓詁考訂，以古書為消遣神明之林園」。唐君毅在「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分析考證學之起因時強調：「當時因無講學自由，為避免遭禍而埋首陳編」。同時錢、唐二人均認為考證學者因避禍而走入故紙堆中，精神上便有一種委屈感，其後又以文物之發明而沾沾自喜，因此氣度狹窄，喪失了知識份子的崇高精神。<sup>⑮</sup>

<sup>⑪</sup> Willard J. Peterson, "Fang I-chih: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In W.T. de Bary ed.,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pp. 369-411. *Bitter Gourd: Fang I-chih and the Impetus for Intellectual Chan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sup>⑫</sup> 章炳麟：《清儒》，《檢論》（臺北：廣文書局，民國 59 年），卷 4，頁 23 上。

<sup>⑬</sup>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 45。

<sup>⑭</sup> Luther C. Goodrich,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 (Baltimore: Waverly Press, 1935). Lawrence D. Kessler, "Chinese Scholars and the Early Manchu Stat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1: 179-200 (1971). 亦見吳哲夫：《清代禁燬書目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民國 58 年）。

<sup>⑮</sup>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 57 年），冊 1，頁 2，自序。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香港：新亞研究所，民國 44 年），頁 113-114。然而錢唐二人對考證之批評重點亦有不同，錢氏強調士人經世理想之淪落；唐氏則重視考證學者喪失了精神價值，「不顧亦不能，直接與活潑新鮮之宇宙人生，自然，社會之事之理接觸」以及「使學術成私人之事，而不能以樹立民族之公共精神為目的」。

在中國大陸的馬克斯主義史家侯外廬也強調政治方面的解釋。他認為考證學的興起主要是受到康熙以來「反動文化政策」的影響。這些政策包括文字獄、薦舉山林隱逸與博學鴻詞以及一些像《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等大型的編纂工作。尤其是四庫計畫徵集了數百位包括戴震在內的有名的學者，成為考證學的大本營。侯氏認為：皇室的鼓勵與「封鎖」限制了士人的學術興趣並形成了新的學術潮流。<sup>⑯</sup>

上述環繞著政治因素的解釋著重文字獄與四庫計畫等歷史事件，但最近一本有關「四庫全書」編纂過程的研究，筆者覺得對上述觀點提出了新的挑戰。該書作者蓋博堅（R. Kent Guy）認為四庫計畫並不是一個完全貫徹皇帝旨意的計畫，相反地，它是在士紳、官僚以及皇室之利益的互動情況之下成長，它受到所有力量的形塑，而並非受到任何力量的完全控制（shaped by all but dominated by none）。作者發現在實行這個計畫的過程中知識份子不僅沒有受到壓迫，而且還積極地利用這個計畫來為本身牟利。這本著作間接地修正了上述視考證為滿族壓迫之結果的解釋，該書顯示滿人的控制與籠絡政策並不足以完全解釋新學術風氣的源起，而清代政治與學術之關係也不像我們過去所想像的那樣單純而直接，士人學術思想發展有其自主性的一面。<sup>⑰</sup>

此外，許多學者都同意文字獄雖會影響士人論政，但論政之外有許多學術選擇，不一定非得從事考證，故文字獄等政策是考證學興起的外緣而非本因，其本因要從內在的演變來探討。<sup>⑱</sup>

有關考證學興起的第四個解釋強調社會經濟變化對學術思想的影響。例如倪文孫（David Nivison）在討論章學誠思想一書中注意到考證和清初士人

<sup>⑯</sup>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卷5，頁410-411。

<sup>⑰</sup> R. Kent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sup>⑱</sup> 強調內在因素的學者如余英時與陸寶千都有這種看法。知識份子對文字獄這類思想箝制的反應有許多方式，例如 Leo Strauss 認為西方的思想迫害使學者發展出特殊的寫作技巧，將寓意隱藏在字裏行間（writing between the lines），而只有會心的讀者才能讀出其真正的義涵。如 Swift 的格列佛遊記與 Montesquieu 的波斯書簡以想像出的幽默故事對專制作嚴厲的批判，就是很好的例子。余英時也指出清初士人在專制淫威下常有「象徵性之隱語」。這些都是對思想箝制的他種反應。見 Leo Strauss,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52), pp. 22-37. Jonathan Swift, *Gulliver's Travels*; Montesquieu, *Persian Letters*. 余英時：〈方以智自沉惶恐灘考〉，收入《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頁511-512。

階層之成長的關係，他指出對於那些因為社會上職位有限，無法藉此博取聲名的士人而言，考證學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方法。<sup>⑯</sup> 雖然他並沒有進一步分析這一問題，但卻已指出由於人口增加造成士人階層的擴大是考證學出現的一個重要的社會背景。

比較廣泛地注意到考證學之社會背景的作者仍推梁啟超。他第一個將考證視為是一個整體的社會運動，而且指出「當運動熱度最高時，可以舉全社會各部分之人人，悉參加於此運動」。他提到當時官員的生活型態、家中藏書、相互討論質疑的風氣；當時豪商閥族的講掖，例如淮南鹽商「既窮極奢欲，亦趨時尚，思自附於風雅，競蓄書畫圖器，邀名士鑑定，潔亭舍豐館穀以待」；著名的書肆；以及出版業聘名流擔任校讎工作等。梁氏認為當時除了學者對考證的興起有所貢獻之外，其它的社會角色亦直接間接地推動此一運動。<sup>⑰</sup>

或許最企圖將中國思想史放在社會經濟脈絡中來觀察的學者是馬克斯主義的史學家。上述的侯外廬是這一研究取向的重要代表。在《中國思想通史》一書中，他將明末清初的變遷視為是「封建」秩序的解體以及商業經濟（資本主義）的萌芽。他認為這一時期的思想發展——他稱為「啟蒙運動」——是社會經濟變遷的反映。根據他的看法，啟蒙運動的領導者像顧炎武、黃宗羲等人，代表了城市中等階級的利益，所以黃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也」的觀念。不過侯氏否認十七世紀顧、黃等人的考證工作與十八世紀考證運動之間的關連。因為對前者而言，考證是經世的手段，但在後者考證卻喪失這種崇高的精神而淪為清廷統治的工具。<sup>⑱</sup> 在書中作者花了很長的篇幅描述十八世紀商業的發展，但遺憾的是他卻沒有澄清這種經濟變遷和學術興起的關係。這種解釋的空隙留給後人繼續研究的機會，艾爾曼的書後來補足了這方面的缺憾（下詳）。

對於近代考證學興起的第五個解釋認為：考證學的興起涉及儒學內部的發展。其中最普遍的看法認為考證是針對理學空談心性而起的反動，故轉而

<sup>⑯</sup> David Niviso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ueh-ch'eng, 1738-180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5.

<sup>⑰</sup>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 106-109。

<sup>⑱</sup>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卷 5，頁 29。有關侯氏論點之描述與批評見 Thomas A. Metzger, "Ching-shih Thought and the Societal Change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Period: Som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 in 《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pp. 21-34。

研究經史實學。這個意見至少可以追溯到顧炎武、黃宗羲等人。顧氏在「答友人論學書」中指出：「今之君子，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sup>㉒</sup>黃宗羲也反對理學家束書游談，力主「窮經」與「讀史」。<sup>㉓</sup>在清初有不少的學者和他們有相同的看法。其後梁啟超（1873～1929）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根據顧、黃等人的意見，更力持這種觀點。他在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清代思潮是對宋明理學的大反動。因為理學研究的是「昭昭靈靈不可捉摸之一物」，後來產生「狂禪」一派，不避酒色財氣；同時士人又受科舉制度的腐化，至明末學術界已無生機。梁氏認為清代的考證學的興起其基本動力是對晚明學風的攻擊與反彈：

承明學極空虛之後，人心厭倦，相率反於沉實。

因矯晚明不學之敝，乃讀古書，愈讀愈覺求真解之不易，則先求諸訓詁名物典章制度等等，於是考證一派出。<sup>㉔</sup>

這一種解釋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被人們廣泛接受，成為明清思想變遷的一個正統解釋。例如蕭一山於民國十二（1923）年完成的「清代通史」以理學的反動為清學成立的第一背景。<sup>㉕</sup>而被譽為民國以來影響力最大的學者胡適（1891～1962）也十分同意這個觀點。胡適認為宋明理學討論了五百年的玄學，結果導致政治腐敗與異族入侵，因此十七、十八世紀反理學運動興起，反對空虛冥想並注重實證。他並大力讚賞考證學中的「歸納方法」合乎西方的科學精神。<sup>㉖</sup>

雷文生（Joseph R. Levenson）在《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一書中也討論到清代的考證學，他將

<sup>㉒</sup> 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亭林文集》，收入《顧亭林遺書彙集》（臺北：中華文獻出版社，民國 58 年），第 6 冊，卷 3，頁 1 下。

<sup>㉓</sup> 見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收入《鮚埼亭集》（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 56 年），卷 11，頁 9 下。

<sup>㉔</sup>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 45、46。此書於 1959 年由徐中約譯為英文，並由史華慈作序，Liang Ch'i-ch'ao, *Intellectual Trend in the Ch'ing Period*, translated by Immanuel Hsü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sup>㉕</sup> 蕭一山：《清代通史》，冊 1，頁 940。

<sup>㉖</sup> 胡適：〈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分別收入《胡適文存》（臺北：遠東圖書公司，民國 64 年），卷 3，頁 53-107 與卷 1，頁 383-412。其後的學者如杜維運也持同樣的觀點，見杜維運：〈顧炎武與清代歷史考據學派之形成〉，收入《清代史家與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 73 年），頁 95。

之置於「經驗主義」(empiricism)的範疇之下。與梁啟超和胡適相類似的是，雷文生同樣將清代的經驗主義視為是對理學的批判，並認為經驗主義具有現代化科學中反玄學、重理性推理與經驗事實的精神。但他認為清代經驗主義雖然在反玄學這一點上與西方科學一致，它本身卻不是科學的，也不必然會導致現代科學的興起，關鍵在於清代學者所問的問題以及所提出的答案與現代科學家大相逕庭。他指出顧炎武等學者雖提出實事求是的口號，但他們卻很少探索事物之間之秩序的彼此關連，或像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 ~ 1626) 那樣以實驗工作與理性推理來建立對自然世界的了解。

在結論中雷文生用「流產的」(abortive)一詞來形容清代的考證學。由此可見他對清代學術思想的根本關懷在於探討：為何考證學無法導致現代科學的興起？<sup>②</sup>這種研究取向在西方漢學界曾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但近年來卻受到嚴厲的批評，許多人指出這種問題的方式沿襲自韋伯學風，帶有強烈的西方中心與目的論的色彩。<sup>③</sup>但雷文生式的思考方式無疑地是根深柢固的，在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 有關清代考證學的重要著作中，他仍然問了一個雷文生式的問題：為什麼考證學無法發展成「現代科學」？<sup>④</sup>

這些主張考證學源於對宋明理學之反動的學者強調宋學與清學之間的不連續性。但有些學者則對這種不連續性有所質疑。最直接對此提出挑戰的是余英時。余英時認為上述的滿洲壓迫論、社會經濟變遷的解釋以及反理學說都是「外緣」，這些因素雖有助於學術的轉向，但卻無法說明為何學者們選擇特殊的題目作為考證的對象，他認為這個問題必須從學術發展的內部變遷來尋找解答。他嘗試以「內在理路」的觀點闡明宋明理學和清學之間的連續性關係。他的觀點相當有創見，但亦有其學術上的淵源，在他之前有好幾位學者曾強調宋明理學與清代考證學的連續性關係。這些看法對余氏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第一位是章學誠，在「朱陸異同」與「浙東學術」（分別作於 1777 與

<sup>②</sup>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3-14.

<sup>③</sup> 對西方漢學中西方中心與目的論取向的批判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61-79.

<sup>④</sup> 艾爾曼所提的問題見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83-84. 該書主旨將於下文作進一步介紹。

1800 年)二文中，章氏認為顧炎武與閻若璩的學術立場源於朱熹(1130~1200)；而黃宗羲與萬斯同(1638~1702)則襲自陸九淵(1139~1193)與王陽明(1472~1529)。雖然這二條學術譜系是章氏所自創，其原因在此無法細論。<sup>⑩</sup>但無疑地他的觀點刺激學者重新評估宋明理學與考證學的關係。因此研究章氏思想的學者多注意到思想的連續性，倪文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sup>⑪</sup>余英時的觀念一方面直接受章氏啟發，另一方面似乎也受到倪文孫的影響。

另一位注意到理學與考證學之連續性的是錢穆，錢氏是余英時在香港新亞書院時的老師。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以「兩宋學術」與「晚明東林學派」為引論，說明清學有其宋明的淵源，這是針對梁啟超對清代學術史之見解所提出的批判。他並指出許多考證學者都深受宋明理學的影響，而且一個學者在漢學(考證學)上的成就要從宋學(理學)的角度來評估。<sup>⑫</sup>

馮友蘭(1895~1990)也看到理學與清學的關係。馮氏認為當清代漢學家討論「義理之學」時，他們所討論的主題以及所用的經典文獻仍與宋明理學家相同，就此而言清代的漢學是宋明理學的延續發展。<sup>⑬</sup>

在西方學術界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也可屬於此一範疇。狄氏認為明代思想有其本身的活力與多樣性，不可一言以蔽之地說是「空虛」，他並指出在宋明理學之內就有一實學的傳統，這些實學家居於十七世紀思想變動的起點。<sup>⑭</sup>狄氏對宋明理學的重新評估使後來學者進一步思考宋學

<sup>⑩</sup> 二文均收入《文史通義》，有關章氏建立學術譜系的詳細分析見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書店，1976)頁 45-81。

<sup>⑪</sup> 倪氏對理學與清學連續性的強調可以追溯到他於 1953 年在哈佛大學所寫的博士論文“*Th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Thought of Chang Hsueh-ch'eng*”。當 1959 年史華慈為徐中約所譯清代學術概論寫序時，他表示這種連續性或可適用於章學誠，但他懷疑可用於說明整個清代的考證傳統。Benjamin I. Schwartz, “Foreword”, in Liang Ch'i ch'ao,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Ch'ing Period*, p. xiv.

<sup>⑫</sup>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冊 1，頁 1。他說：「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然其時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菴、習齋，一世魁儒耆碩，靡不寢饋於宋學，繼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謝山、乃至慎修諸人，皆於宋學有甚深契誼。而於時已及乾隆漢學之名，始稍稍起。而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往往視其所得於宋學之高下深淺以為判。」

<sup>⑬</sup> Fung Yu-lan,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Tr. by Derk Bodde, vol. II, pp. 630-31.

<sup>⑭</sup> 狄百瑞曾編好幾本這方面的書，可謂西方漢學界中研究理學之先導，見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Principle and Practicality: Essays in Neo-Confucianism and Practical Lear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與清學的連續性問題。總之這些學者均已認識到反理學情緒之本身不足以完全孕育考證學的興起，理學與實學之間雖有牴觸，但也有連續性的一面。筆者認為上述這些作品所形成的學術背景使余氏注意到理學與考證學之間的「內在」關係。

余氏以為宋明以來儒學發展的一個內部動力是程朱學派和陸王學派之間的辯論，這個辯論是長久以來儒學之中「尊德性」與「道問學」之間的衝突。至晚明這二派都各自堅持本身的學術立場而無法說服對方，而雙方又都堅持本身所言是儒學的原始義涵，因此義理的辯論就演變為如何發明經典之真正義涵的辯論，而玄學思考也就逐漸為經史考證所取代。

為了支持以上的論斷，余氏指出清代學者的考證作品很多是以考證的方式來談義理問題，而延續了程朱與陸王的辯論，例如顧炎武和閻若璩的考證作品是為了反陸王，而陳確（1604~1677）、毛奇齡（1623~1716）的考證工作實際上是將矛頭對準了程朱。至此學術的戰場已從玄學思辯轉移到考據。同時他認為就儒家思想的整體演變而言，明學至清學的轉變是從「尊德性」到「道問學」，亦即是從強調道德面轉向強調知識面。清學中考證與經世二者都顯示了儒學「道問學」精神的高度發揚。所以他將這整個過程描述為清代知識主義的興起。<sup>⑤</sup>

除了余英時之外，從程朱、陸王之爭的角度觀察考證學之興起的學者還有陸寶千。他在「論清代經學」一文指出明中葉之後朝政日非、邊患日亟而有經世思想的興起，由於要求經世所以轉向儒家經典汲求治道之泉源，因而造成經學研究的盛行。但為什麼以考據的方法來治經？陸氏以為此則涉及程朱、陸王之爭。因雙方力圖互相否定，在爭辯中除了運用玄學思辯之外也注意文獻的探討，以「取證於經書」來支持自身的論點，學者因而從事考證；陸氏並更進一步從程朱陸王哲學上的差異認為陸王主張心理為一，故不以讀書為必然；程朱以心、理析為二，心以經書為對象，故程朱理學蘊含有從經書體認義理的精神，而正音讀、通訓詁是了解經書的第一步。所以陸氏認為

<sup>⑤</sup> 余英時的觀點見上述論戴震與章學誠之外，尚有〈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原載《中國學人》，期2（1970），頁19~41，後收入《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65年）；〈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歷史與思想》，頁121~156；英文論文見Yü Ying-shih,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Ch'ing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1: 105~146 (1975).

「考據爲程朱理學中所必蘊之物」，清初官方力倡朱學，爲考據學的興起奠定基礎。<sup>⑤6</sup> 陸氏的解釋不但與余英時的看法不謀而合，更重要的是點出了經世思想興盛對考證的影響。

也有學者從氣的哲學之角度分析考證學的淵源。日人山井湧早在一九五〇年就注意到這一點，他詳細地追溯明清時期以「氣」爲主之哲學取代朱熹以「理」爲主之哲學的過程。他認爲氣的哲學至戴震而完成，而此過程可溯及明代羅欽順（1465～1567）、王畿（1498～1583）、呂坤（1534～1616）、劉宗周（1578～1645），至清初則有陳確（1604～1677）、黃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顏元（1635～1704）、李塨（1659～1733），到十八世紀除戴震（1724～1777）之外還有程瑤田（1725～1814）、凌廷堪（1755～1809）、焦循（1763～1820）、阮元（1764～1849）等二十四位學者；而上述學者中有多位是著名的考證學家。他認爲這二者之間所展現的一致性並非偶然，這展現了氣的哲學與考證學的內在關連。因氣的哲學之興起與王學有關，在結論中他指出：以考證學是「源於以左派王學爲中心之明代心學之反動」的論點有重新檢討之必要。<sup>⑤7</sup>

錢新祖對焦竑（1540～1620）的個案研究也從思想史的觀點對考證的源起提出一新的見解而與上述山井湧的論點也不無關係。他以明末對考據甚感興趣的陸王學者焦竑爲例，說明考證學源於陸王。他指出焦竑一方面支持陸王學派反對程朱學派，另一方面又對佛道思想有高度的興趣，但他對佛道的興趣並沒有導致對儒學的否定，他是由儒進於佛道，並認爲佛道是儒學的進一步開展，最後他並由此而達到對儒學的重建。重建後的儒學對程朱學派「理氣二元」的理論有所挑戰，提出「氣的一元論」。這種觀點認爲理不再是「氣中的理」（*the li in ch'i*），而變成「氣之理」（*the li of ch'i*）。作者認爲重建的儒學對後來清代的發展有相當有意義的啟示，尤其重要的是它構成了清代考證學運作的脈絡。他同意前述梁啟超視考證爲理學之反動的說法並非全無事實根據，但他以爲考證學者對王學與王學左派的批評之邏輯是出於上述重建後的儒家思想。他以下棋作比喻，認爲晚明的「狂禪」論者和清考證學家雖然互相攻伐，但玩的卻是同樣的棋。傾向陸王又主張三教合一的焦竑、反理學並爲漢學代言人戴震，與攻擊戴震的章學誠雖學術立場截然不

<sup>⑤6</sup> 陸寶千：〈論清代經學〉，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3（民國64年），頁1-22。

<sup>⑤7</sup> 山井湧：〈明清時代における氣の哲學〉，《哲學雜誌》，46: 711 (1951)，頁82-103。

同，從「氣的一元論」之角度來看三者卻是屬於同一論述傳統（discursive tradition）。所以他認為考證學是從陸王學派一系發展出來的<sup>38</sup>。

錢氏的論點遭到余英時強烈的批評，他的批評有以下幾點：

一、余英時認為錢氏的論點太模糊，書中有許多地方在用字與論證上讓讀者捉摸不定而似懂非懂。

二、余英時從史料運用的角度提出質疑，他認為作者引《焦氏筆乘》為史料有些時候並不適當，因為該書為焦竑的讀書筆記，許多部分是抄自他人著作，不可一概視為焦氏的思想。余氏發現有許多關鍵性的史料實際上是焦竑引趙貞吉（1508～1576）的作品。對於余氏這一點批評筆者並不完全同意，焦氏筆乘中雖有不少引自他人的話，這些部分在運用時要十分謹慎，但未嘗不可在其中找到焦氏思想的線索。事實上每一個人的思想中都包含了他人的思想。

三、余英時以為焦竑的考證興趣不是受其哲學立場的影響，而是從閱讀楊慎、梅鷟等人的作品而得到的刺激。他認為焦竑作為一個理學家、考證學者以及文人可以分別從明代三個學術潮流——哲學、考證、文學——來理解，這三者雖非無關但有其自身脈絡的發展。例如他指出明代的考證即是繼承了宋元傳統而發展。余氏反對將焦竑的理學與考證二方面的興趣建立內在的關係。

四、最後余氏剖析氣的一元論與考證的關係。他強調氣的一元論源於程朱學者羅欽順，並引章炳麟的看法認為戴震有關理氣的理論是從羅欽順來的。因此若要從理學傳統中找尋考證的根源，余氏以為與其強調陸王還不如強調程朱。他並懷疑可以將焦竑、章學誠說為氣的一元論者。總之他同意建立氣的哲學與考證之聯繫是一個迷人的課題，但必須謹慎處理。他以為 Irene Bloom 的說法較恰當：

許多主要清代思想家，包括十七世紀的王夫之與十八世紀的戴震，亦支持氣的哲學，因此可以辯稱氣的哲學雖不是考證的先決條件，卻必然是伴隨著清代考證的新型態而發展。氣的哲學雖然無疑地是清代思想的重要主題以及許多著名思想家關懷的重點，但是在大多數的時候

<sup>38</sup> Edward T. Ch'ien, *Chiao Hung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M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它卻似乎不是興趣之所在與辯論之焦點。<sup>39</sup>

上述的學者分別研究了影響清初考證學興起的內在與外在因素，至此綜合性的研究方有其可能，一九八四年一本有關清代考證學的專書終於出現了，該書雖早於錢與余的辯論，卻綜合了上述多數的論點，此即艾爾曼的《從哲學到考證——帝制晚期思想與社會方面的變遷》。該書的主旨是研究明清江南地區考證的源起、發展與意義，而他同時注意到內在與外在二方面的因素。全書三分之一的篇幅用來描述內在思想的演變，山井湧、Irene Bloom 與余英時的作品都為作者所引用，而三分之二的篇幅則分析促成江南地區考證成長的社會與制度因素。該書對內在因素的介紹多依靠二手的研究；有關外在因素的分析則頗有創意，上述梁啟超所提到的社會因素作者都作了深入的探討。他提到豪門巨室的支持、官方與私人圖書館的設立、出版與印刷業的興盛等。尤其重要的是他以引自 Thomas Kuhn 的學術社羣的概念闡明社羣內知識溝通的管道，例如共有的研究方法、通信、集會、集體合作等，這些因素構成學術社羣的共識。作者以為這種共識的產生對考證的發展十分重要。<sup>40</sup>

艾氏著作成功之處有二點：第一，他澄清了考證運動的社會根源，因此我們可以了解考證不僅是思想變遷的產物，或是對政治情況的反動，它同時也受社會組織與溝通型態的影響；第二，他的討論結合了促成考證興起之內在與外在二方面的因素，使讀者對此一運動有一持平的了解。這二方面的貢獻使該書成為有關此一主題的重要著作。但筆者也覺得該書有些美中不足之處，例如上述雷文生式的問題仍帶有西方中心的線性史觀，似宜避免，中國文化的發展，不一定非得走西方文化所曾走過的路；如果改問「考證學與中國近代科學發展的關係」或較適合。其次是作者似乎假設所有的讀者對清代學術史有相當的了解，因此對一些專有名詞如「漢學」、「宋學」、「今文」、「古文」以及其間相互關係並沒有詳細說明，因此對背景知識不強的讀者來說，閱讀上十分困難。

在過去七十年間有關考證起源的研究經歷了很大的變遷。這個變遷饒富

<sup>39</sup> Yü Ying-shih, "The Intellectual World of Chiao Hung Revised: A Review Article," in *Ming Studies*, No. 25 (1988), pp. 24-62. 所引 Irene Bloom 的意見見 *Knowledge Painfully Acquired*, pp. 31-32.

<sup>40</sup>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該書的中文評介見黃進興《漢學研究》第4卷第1期（民國75年）上的書評。

趣味地展現了不同方法論之間的互動，在這過程中最重要的著作無疑要推梁啟超、余英時與艾爾曼三人的作品，而累積的研究成果使歷史的圖像日益清晰。最後我們再回顧這些解釋：

1. 考證源於明末前後七子的復古以及楊慎、陳第、方以智等人個人的經歷與博學的雅好。
2. 考證學受到耶穌會士所傳西學的影響。
3. 由於清廷的高壓統治與籠絡，士人參加政府的學術計畫或自行從事與政治無關的考證工作；並有學者由此評估考證學者精神上的淪落。
4. 考證學與社會經濟變化有關，社會中的許多成員如官員、商人的獎掖、出版印刷業的發達以及人口的成長都直接間接促成此運動的發展。
5. 考證學源於思想性的因素或儒學內部的發展，例如認為考證的興起涉及於對宋明理學「空談心性」之反動，或認為受程朱陸王的辯論、氣的一元論的提出、經世思想的出現等因素影響。
6. 認為考證學的出現是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的交互影響，並強調上述第四項社會經濟變化的重要性。

上述的解釋雖已建構了大致的輪廓，但筆者認為還有幾個相互有關的工作值得繼續努力：第一，可以對更多的明清考證學家作個案的研究以進一步檢驗上述觀點的有效性；尤其是當各項解釋因素間有衝突時，應釐清何者為主、何者為從、以及何者無關。最後我們必須承認考證學的源起是多元性的，不同的個案適用不同的解釋因素。<sup>④</sup>第二，清代另外二個學術主流——氣的哲學與經世之學——和考證學興起之間的關係還不够清楚，在研究過更多的個案之後，對此問題有進一步澄清的必要。第三，明清之際社會變遷對考證（或實學）的影響還可再作深入探討，由於人口與商業活動的激增，士人所處的環境有根本的改變，這些改變對士人的生活以及傳統儒家理想構成一新的挑戰，而它所產生的影響除了倪文孫所指出的一點之外還有那些？第四、考證學（或實學）與近代中國科學發展的關係如何？如果不從目的論的角度觀察，可以試問它在中國科學發展史上扮演何種角色？第五，近代考證學的興起對中國近代社會文化或現代化的過程有何影響？例如考證帶起的今文學運動與古史辨運動已有學者作過研究，但是在其他方面還有那些衝擊？第六，除了歷史性的描寫與分析之外，亦不可忽略哲學性的評估工作，唐君毅與錢穆對考證的歷史角色已有評論，他們的評論是否恰當？筆者認為這些研究工作將會增加我們對清代考證運動乃至整個近代思想史的了解。

<sup>④</sup> 筆者認為如陳第、梅鷟、劉獻廷、陳確、毛奇齡等人都可再作深入的探討。